可控的不确定性*

——泰国清迈华人青年数字游民的旅居实践

邓燕华　戴嘉纯　涂鸿伟　刘颖

青年研究
2026·5

摘　要：本文基于对泰国清迈华人青年数字游民的田野调查，提出“可控的不确定性”这一概念，探讨个体在面对跨国流动中的不确定性时，如何通过多重策略性实践，将流动中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承受、可利用的生活条件。研究发现，华人青年数字游民通过选择文化亲近、制度可靠的目的地，建立具有跨地域延续性的日常生活秩序，并策略性地运用身份标签，使旅居中的不确定性尽量可控。但是，因个体在经济资本、专业技能与社会网络支持上的差异，这种“可控”的程度往往在群体内呈现明显分化。

关键词：数字游民　可控的不确定性　全球化　跨国流动
DOI:10.27017/j.cnki.qnyj.2026.05.004

近年来，数字经济与远程协作的快速发展重塑了青年劳动和生活的组织方式，数字游牧（digital nomadism）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全球现象。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以远程工作者或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不同城市间迁移，保持一种介于工作和旅行之间的生活状态。作为深受这一群体青睐的目的地，泰

* 本文系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第一届“走向世界的田野”海外科考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国清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尼泊尔加德满都等地逐渐聚集了数量可观的数字游民。他们通常不具有长期居留身份，也未进入当地就业市场，而是通过线上接单、平台工作或项目合作等方式维持生计。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高度灵活、自由、去中心化且强调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

在这些目的地之中，清迈因生活成本较低、文化距离适中、基础设施完善、华人社群较为活跃等条件吸引了一批华人青年数字游民。他们多以中文为母语，与中文社群网络的关系紧密，并以中短期旅居的方式在清迈生活。在对这一群体进行观察时，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尽管数字游民的跨国生活在制度、收入和未来规划上充满不确定性，但许多受访者并未将这种不确定性视为亟待消除的风险；相反，他们往往通过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将生活维持在一种既不完全稳定也不彻底失序的状态。例如，他们并不刻意寻求长期签证与固定身份，而是倾向短期停留与阶段性规划；他们选择文化距离适中、生活成本可控的城市，而非彻底陌生的环境；他们一方面强调自由、探索和灵活性，另一方面又借助家庭支持、技能积累或回国的可能性，为自己划定可控的安全边界。这些观察推动我们追问：华人青年数字游民的跨国生活是如何展开的？在不稳定的结构条件下，这些青年如何在实践中组织和利用不确定性？当不确定性并非完全以焦虑或风险的形式存在时，它对我们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流动与青年生命历程意味着什么？

本文讨论的不确定性是指行动者难以对未来居留、工作、收入、社会关系和生活安排形成稳定预期的状态。对清迈的华人青年数字游民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既来源于签证制度、居留期限和工作资格等跨国流动方面的制度限制，也体现为远程工作的波动性、社会关系的流动性和人生规划的开放性。不同于将不确定性理解为被动承受的结构性后果，这一群体往往通过具体的生活实践不断地调节和组织不确定性。基于在泰国清迈开展的田野调查，本文提出“可控的不确定性”这一分析性概念。该概念强调个体的能动性，意在说明对一些行动者来说，他们并不总是以消除不确定性为目标，而是关注如何将不确定性从潜在风险转化为一种可承受、可利用的生活条件，并将之纳入日常生活的安排之中。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本文试图展示，在全球流动性加速扩张的背景下，华人青年如何在新的空间与社会条件下组织生活，并重新在跨文化环境中形成对自我和未来的想象。通过这些探讨，本文旨在为理解当代青年的跨国流动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一、数字游民及其面临的不确定性

“数字游民”这一概念产生于20世纪末，被用来描述那些借助信息技术实现工作不受地点约束、在全球范围内灵活移动的个体（Makimoto & Manners，1997）。践行这种生活方式的群体具有高度流动性，他们将数字技术融入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之中，进而能够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远程办公与旅居（Hannonen，2020；Woldoff & Litchfield，2021）。不仅如此，数字游民被视为包含数字工作、零工经济、游牧生活与全球旅行四个要素的复合体（Nash et al.，2018）。有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数字游民群体内部的多样性，指出他们中既有以高技能远程雇员为主的专业型游民，也有以平台工作者为主的零工型游民，还有把旅居作为生活转型阶段的探索型游民与追求长期第二居所的定居型游民等（Cook，2023）。由此可见，既有研究普遍认为，数字游牧是一种重新组织生活中的劳动、空间和时间的复合实践。

数字游民的旅居似乎以“去地域化”（de-localization）为主要特征，但这一实践并未真正消解空间的重要性，城市和社区仍然为数字游民提供了制度性与社交性锚点，使他们的流动不至于沦为完全无根的漂泊（Hermann & Paris，2020）。凭借较低的生活成本、相对灵活的签证政策与成熟的共享办公生态，清迈、巴厘岛等地区逐渐发展为数字游民的集聚地（Naphattamon Sae-Phan、王元超，2021）。这些关键因素虽然在功能上限定了数字游民的流动范围，但也为他们提供了抵御流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日常资源。

与此同时，数字游民的身份不仅是实践的产物，而且是话语和媒介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建构的结果。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游民倾向在社交媒体上着重呈现这一生活方式中自由、松弛和冒险的一面，以此掩盖与消解迷茫、孤独等内在痛苦，进而完成对理想自我的积极塑造（马中红、井常灿，2024）。媒介既是他们的工作工具，也是他们建构身份、获取资源与维系社群的平台；线上实践既是他们的工作所需，也是他们寄托情感的方式（张月月、李彬，2025）。然而，这种高度依赖媒介技术的生活形态也带来新的约束，即他们的媒介社会化与现实社会化处于割裂状态，虚拟场域的社交难以深化，现实场域中熟人社会的“附近”与青年社交偏好之间又存在壁垒（曾昕、沙垚，2024）。数字游民的流动既拓展了自由空间，也叠加了新的制度和情感的不稳定性。

因此，在数字游民研究中，“不确定性”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一方面，他们被描绘为脱离传统组织束缚、实现时间和空间自主的典型主体（Makimoto & Manners，1997）；另一方面，他们在收入稳定性、社会保障与法律地位上处于高风险状态（Standing，2018）。频繁更换居住地点导致社会网络难以稳固，与家人的空间距离削弱了情感联结，文化差异则进一步加剧了情感隔离，孤独感、关系原子化与身份悬置被视为流动性生存状态的直接后果（Miguel et al.，2025）。姚建华（2025）发现，数字劳动高度依赖技术基础设施和平台逻辑，使工作与休闲的边界模糊，并加剧了收入和身份的不稳定。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多将不确定性理解为这一群体在新型劳动形态与流动形式下面临的结构性后果，较少关注不确定性在行动层面如何被持续管理。

在更广泛的社会理论层面，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也经历了从“风险”到“生活条件”的转向（文军，2023；King，2018）。传统的风险社会理论强调现代性带来的制度失衡与责任个体化，而近年来的讨论则进一步指出，不确定性并不只是一个需要被消除的风险，更是一种伴随高度流动性的社会而来的常态化生活条件。在这一框架下，生活中临时性和阶段性的停泊被视为行动者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调节节奏、寻找平衡的策略，而非短视或失败的表现。因此，在个体的主观认知上，不确定性从“被动承受的结果”变为“被组织与调节的对象”。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可以说，不确定性正在从“风险”范畴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分析对象（文军，2023）。在既有的讨论中，不确定性不仅指未来不可预测的状态，更是一种嵌入制度结构、社会阶层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的基本条件。与风险不同，不确定性往往难以被量化和计算，其核心特征在于开放性与不可穷尽性。因此，个体和组织无法单纯通过规避或消除不确定性来获得稳定，而是要通过重新组织时间节奏、空间安排与关系网络，使不确定性被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这一理论转向意味着不确定性既可以带来焦虑和失序，也可能成为创造性行动与生活重构的契机。在此意义上，它既具有结构性约束，也蕴含实践性空间。这一视角为理解数字游民现象提供了重要启示。如果将数字游民的不稳定状态简单理解为风险暴露或制度缺失的后果，我们便难以解释为何有些青年会主动选择这种流动的生活方式。只有将不确定性视为一种需要被持续调节和组织的生活条件，他们在失控与可控之间寻找平衡的实践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

因此，研究者开始考察行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未定状态。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的“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为探讨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的常态化提供了宏观图景。这一概念意在强调，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从制度化组织与职业路径中脱嵌，失去稳定的身份和依附关系，需要自行承担规划生活、管理身份、应对不确定性的责任（Bauman，2000：62）。作为“液态现代性”的典型表现，“液态迁移”（liquid migration）这一行动模式是指个体在多个地点之间流动，体现了跨境移动的临时性、循环性与机会主义特征（Engbersen & Snel，2013）。有学者提出“有意图的不确定性”（intentional unpredictability）这一概念，更明确地说明部分青年移民在有意地保持未来规划的开放性。[①] 这一概念随后被运用于欧洲青年流动研究，用以揭示青年如何将不确定性作为策略性资源，主动维持生活与工作路径的开放性（King，2018）。然而，这

① John Eade，Stephen Drinkwater & Michał P. Garapich，2008，*Class and Ethnicity*：*Polish Migrant Workers in London*，10 月 21 日（https：//doc. ukdataservice. ac. uk/doc/6056/mrdoc/pdf/6056uguide. pdf），最后访问日期：2026 年 7 月 20 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些研究侧重行动者的选择逻辑，对不确定性如何在制度约束与资源差异中被实际管理关注不足，它们往往预设了制度条件相对宽松与资源分布相对均衡。事实上，那些看似偏好“液态现代性”的迁移者，仍期待建立稳定且扎根的生活，而且他们的未来选择也受到经济状况及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就业条件的共同影响（Bygnes & Erdal，2017）。在制度约束力更强、流动成本更高的华人青年生活情境中，不确定性并不单纯体现为“保持开放性”的价值取向，而更多呈现为在多重约束下被压缩、分段与计算的状态。

近年来，学者也将视角转向数字游民的日常实践，探讨他们如何在持续流动中重建秩序（King，2018）。研究显示，数字游民发展出了多种策略来缓解不稳定，包括寻求多元收入来源、通过线上社群获取信息与情感支持等（徐琳岚、文春英，2023）。王云龙和文军（2024）的研究揭示了数字游民在不确定性中构建自主性的实践逻辑，他们发现，数字游民凭借信息技术赋予的劳动资本，践行工作与生活相融合的理念，并采取循环流动的策略，将外部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内在的“渐确定性”。这些研究分别探讨了收入安排、信息支持、劳动技能和流动节奏在维持数字游民生活中的作用，但主要着眼于具体实践及其结果，没有用一个统摄全局的分析性概念，去探讨不确定性本身如何被作为一种需要被持续管理和控制的生活条件。

基于上述研究脉络，本文提出“可控的不确定性”这一分析性概念，用以理解华人青年数字游民的旅居实践。从问题是否已知、结果能否预判出发，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可以区分出“确定的确定性”“确定的不确定性”以及“不确定的不确定性”三种认知状态，其中“确定的不确定性”是指问题已知而结果未知（Jansen et al.，2019）。本文讨论的“可控的不确定性”刻画的正是青年数字游民对“确定的不确定性”的掌握。他们通过各种策略性的选择，使已知的未知尽可能地可控，而这成为“游牧”生活得以维持的关键。这一概念与上述“有意图的不确定性”“渐确定性”等概念存在一定差异。“有意图的不确定性”侧重描述行动者为何主动维持开放性，又为何将不确定性作为价值取向，分析焦点在于个体的策略性选择。“渐确定性”虽然同样关注转化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过程，但更侧重论述个体如何通过行动在宏观层面逐渐获得确定性感受，在本质上仍然将不确定性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控的不确定性”这一概念既不消除也不浪漫化不确定性，它指的是行动者通过嵌入具体的制度、空间与关系网络，将不可预知的外界不确定性转化为可计算、可承受且可利用的确定性，进而实现流动生活的动态维系。“可控的不确定性”蕴含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它不仅包含个体与不确定性共处的主观策略，而且将分析视野扩展到多重结构锚点如何共同构成一个支撑体系，使不确定性的可控成为可能。

二、研究方法与田野介绍

泰国清迈是近年来全球数字游民的重要聚集地之一，逐渐成为华人青年数字游民跨国流动中的关键节点城市。清迈并非一个典型的长期移民目的地，但它兼具较低的生活成本、灵活的居留政策与宽松的文化氛围，成为许多青年出国后尝试重建生活节奏的过渡性城市。另外，清迈既与华人文化圈在语言、饮食和社交习惯上存在亲和性，又保有明显的异国社会结构，这使华人青年数字游民能够在这里感受到文化距离与适应难度的独特张力。因此，清迈能够成为理解华人青年数字游民在跨国流动中管理不确定性的关键观察场域。

研究团队自 2025 年 7 月起进行前期调研与联络准备，并于 2025 年 8 月抵达清迈，开展了为期 10 天、安排紧凑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期间，研究团队走访了清迈主要的数字游民社区与共享办公空间，并重点进入其中三个由华人担任“主理人”的数字游民社区，通过参加数字游民社群聚会、兴趣小组与主题分享会等活动开展参与观察。研究团队共访谈了 29 人，受访者以数字游民为主，另有几位数字游民社区的“主理人”和工作人员。①

① 本文对受访者进行了匿名化处理，文中引文标注格式为“(化名，访谈日期)”或“化名(访谈日期)”。例如，“(雪莉，20250824)”即表示该引文出自 2025 年 8 月 24 日对受访者雪莉的访谈。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受访数字游民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40岁，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中有平台自由职业者、远程雇员、内容创作者和创业者。多数受访者拥有多段跨城市或跨国流动经历，流动时长为6~18个月，在清迈或其他城市的单次停留时长为1~6个月。也有一些受访者是第一次跨国流动，清迈是他们的首个跨国旅居目的地。访谈围绕受访者的流动动机、地点选择、制度应对、在地社群互动、身份认同与未来规划等主题展开，重点关注他们如何在制度相对明确但存在限制的条件下，通过安排停留时间、组织日常生活以及调整身份叙述等具体实践维持生活秩序。

此外，为弥补线下观察时间较短的不足，除田野调查外，本研究还运用了网络民族志的方法，通过追踪受访数字游民的社交媒体、清迈数字游民社群平台上的内容分享等途径，观察数字游民在网络平台上的自我呈现，识别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话语策略。

三、地点选择中的不确定性管理

在跨境流动研究中，“地方”（place）一直被认为是影响行动者策略选择的重要变量（Bozzi，2024；Green，2020）。对华人青年数字游民来说，地点选择是管理不确定性的首要环节。目的地不仅是生活成本与制度优势的组合，而且是他们在全球化流动图景中实践自我建构的重要文化场域。清迈能够在近年来成为华人青年数字游民的重要聚集地，不仅与其相对宽松的签证政策、较低的生活成本有关，更与华人青年数字游民对异质性体验的适度追寻密切相关。

清迈对华人青年数字游民的吸引力来自它兼具熟悉感与陌生感。这里不能被简单视为完全陌生的异域。在地方文化的维度上，中泰两国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交流由来已久，这使华人青年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能体验到文化的连续性与亲和性。同时，清迈在社会环境和生活节奏上均有别于中国的大城市，因此对华人青年数字游民来说，它确实又是异域城市。对需要在短期内建立起可操作日常的数字游民来说，这种“半熟悉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性”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上的熟悉降低了迁移的心理门槛与适应成本，也减少了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而差异的一面又为他们比较、探索和重新想象生活提供了空间。

这种地点选择逻辑在受访者讲述为何选择清迈旅居时明显地表现出来。雪莉（20250824）在比较了不同城市的生活体验后认为，“从人文、氛围、物价、国际化程度等角度来看，我在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替代清迈的城市。我去了很多地方，就我目前的生活状态而言，清迈是最适合我的。我觉得我就算是到处去旅居，也会回到清迈”。这一评价表明清迈提供了一个能够重新组织生活关系的空间。

在清迈，那些在大城市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间秩序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商业活动和工作场所的运转不完全围绕工作效率与消费需求展开。华人青年数字游民在与清迈的反复接触以及与其他城市的比较中，逐渐将这种慢节奏、有地方感的体验整合为一种以生活为中心的理想状态，差异化的经验承载了华人青年数字游民对新的生活和劳动方式的想象。在比较和想象的过程中，一种虽具有不确定性但更贴近理想的生活图景被建构出来。小双（20250827）这样描述清迈的日常生活节奏：“举个例子说，我如果下午五点出去，就会发现很多咖啡馆已经关门了。然后夜市也结束得比较早。你看现在这么迟（上午 10 点左右）了，很多饭店都还没有开门，就连提供早午餐的店都没有开门。我觉得这里的人是‘在生活’的一个状态。”在这一体验中，清迈被感知为一个不以工作效率为中心组织日常生活的地方。这种差异性促使个体重新思考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并为反思自身处境提供了一种可供参照的框架。

这种对清迈的想象具有双重功能。第一，对照性的经验能够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生活节奏和价值取向，使青年从高度轨道化的人生路径中暂时抽离。第二，它增强了个体对开放未来的理解力与承受力，使不确定性被视为可积极面对的状态，从而被纳入个体的生活安排之中。正因如此，在清迈生活更多被视为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过渡阶段。正如雪莉（20250824）所说的，‘我先去清迈看一看，然后可能再通过清迈看到比这更大的城市、更大的世界”。由此可见，面对无法一次性决定的未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行动者通过“停泊—调整—再出发”的方式，将不确定性进行拆解和分段管理，进而使当下的生活具有相对确定的结构。

清迈作为旅居地，不仅为华人青年数字游民提供了一种相对松弛的生活，而且让他们能够较为从容地组织和利用不确定性。然而，这种建立在地点经验之上的可控性始终嵌套于国家治理的框架中。因此，清迈之所以能够成为可以反复或长期停泊的地点，不仅因为它在文化上适合生活，还因为数字游民可以通过制度要求判断自己进入的条件以及可停留的时间，对自己的行动有所掌控。

从这一角度来看，跨境流动不仅受个人意愿的影响，还受制度规则、基础设施以及国际关系共同构成的“允许结构”的制约。制度环境既决定了何种个体能够流动，也限定了个体进入、停留和工作的方式（Sheller & Urry，2006）。清迈对数字游民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城市生活本身，而且源于一个“进入容易、停留宽松”的制度环境。多位受访者提到泰国在政策层面的开放。尼尔（20250826）明确指出，“泰国政府挺支持数字游民的，有泰国目的地签证[①]这些制度，包括旅游签证的有效期也非常长，比较方便”。较低的制度门槛使跨国流动从一种有潜在风险的行动转变为一个可以规划的生活选项和在规则内运作的策略性实践。但是，这种开放始终受限于制度边界，泰国政府会借助签证制度和就业审查来界定数字游民的行动空间。亚飞（20250824）反映“泰国在工作收入这方面的法律非常严格，如果没有工作签证的话，你不能做任何工作性质的事情，不能在这里赚钱。”

正是在清楚认知制度边界的前提下，“可控的不确定性”逻辑更明显地体现出来。受访者普遍清楚自己的签证状态、居留期限与合法劳动边界，他们在制度限制内进行精细化计算，通过短期居留、频繁更新签

① 泰国目的地签证（Destination Thailand Visa，以下简称为 DTV）是泰国政府于 2024 年推出的长期签证，专为数字游民、远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等人士设计。该签证的有效期为 5 年，持有人每次入境最长可在泰国停留 180 天，期满前出境后再入境，可以凭有效的 DTV 签证重新获得 180 天的居留期。该签证持有者不享受泰国本地福利（如免费教育、医疗保障），且禁止在泰国本地就业。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证或灵活变动停留地点等方式，不断调整自身的合法身份与空间位置，进而维持一种既不中断流动又不完全失序的状态。例如，一些受访者会在签证即将到期前回国，或是前往邻国短暂停留后再次进入泰国，也有人根据签证情况更换居留地。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他们的自由是在制度允许的框架内展开的“可控自由”。

华人青年数字游民对地点进行筛选，使自身置于一个陌生程度适中、生活成本可以估计、停留期限可被规划的环境中。地点选择的确可以减少部分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但真正决定流动是否可持续的关键是个体能否在已选择的地点中建立一套可以维持的日常秩序。

四、日常的不确定性管理

选择合适的地点为华人青年数字游民持续组织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个体仍然需要面对签证期限、收入波动、远程工作不稳定等问题。他们必须通过各种安排，使这些不确定性维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跨国流动的生活往往从新奇感开始。华人青年数字游民初到清迈时，陌生的语言、迥异的街景以及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为他们带来了新奇的体验。在回忆初到清迈的感受时，米拉（20250824）表示，“刚来的时候觉得清迈所有的东西都很新鲜”。这种新奇感在初期成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能量，推动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活动、结识他人以及融入社群。

然而，新奇感不免会随着时间而消退，难以成为支撑生活的长期动力。米拉（20250824）指出，“新奇期无非就是前面一两个月，这段时间过去了，就是过日子”。这一从新奇到日常的转变，也是数字游民在跨境流动中逐渐建立稳定日常的过程。部分受访者在新奇期过去后会主动降低社交密度、减少探索性活动，将生活重心集中至工作、休息和固定的日常活动中。多位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工作时间有很大的弹性。例如，李奥（20250825）说自己“每周可以自由地选择两三天进行工作”；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童童（20250827）也表示，“相对来说比在办公室上班更自由”。然而，仅实现空间自由而无时间自由的远程工作者同样不在少数，“有的数字游民只是不需要坐在办公室，但大部分时间仍然要听公司的安排”（童童，20250827）。这类经历呈现“可携带的时间结构”特征，即生活节奏未随空间的改变而被彻底重塑（Elliott & Urry，2010）。

因此，新奇被保留在表层，而生活节奏却在深层延续。所有的流动都需要停泊点（Sheller & Urry，2006），新奇感可以促进一段流动的开始，但日常秩序的维持需要深层锚点的支撑。受访者的经验表明，经济收入、可迁移的技能、家庭支持与社群关系共同构成了确定性的锚点，它们使生活的部分领域保持稳定，进而使个体能够承受其他层面的开放性。

经济收入构成最基本的安全边界，为不确定的流动生活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提供了基础。当被问及怎样才能做一个数字游民时，很多受访者表示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收入，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流动生活很容易转化为持续的焦虑和风险。李奥（20250825）认为，数字游民的工作更适合中产及以上阶层的个体去做，“需要经济资源，需要能够赚钱。清迈这里不太适合在当地社会里去赚钱，所以一定要有外面的收入来源去支持（你在这里的生活）”。华人青年数字游民中不乏精打细算的人，他们通过精细的财务规划来管理流动中的收入不确定性。例如，亚飞（20250824）通过收支计算控制经济风险，“我是做好打算的。就是说我平时手里还剩多少钱，我在这边一个月花多少钱，我心里边是有个数的。正好到下个月就能收支平衡”。由此可见，经济资源充足的个体能够承担试错成本、延长流动周期，而经济资源有限的个体则更有可能将流动压缩为短期的停泊。

除经济收入外，可迁移的技能同样构成数字游民生活秩序得以维系的关键锚点。擅长远程工作、自我管理、情绪调适与跨文化沟通被多位受访者视为维持跨国生活的重要能力。生活节奏反复变化以及未来规划尚未明确均要求行动者具备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情绪调适能力。崇豪（20250823）坦言，“没有一个能让自己扎根的工作，这就是我的弱势，但我可以承受，我想那是不是可以用我的广度来弥补我在工作深度上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不足”。数字游民一方面不断地问自己，“我想要这样的生活，那我该如何持续这样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难免因与同龄人的比较而感到焦虑，“因为大部分在国内的同龄人都在同一个节奏里面，所有人都在上班，我自己有时候会很焦虑，会思考我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下去”（米拉，20250824）。针对这类焦虑、内耗的情绪，易可（20250827）表示，“旅途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怎样去调整情绪和心情，这对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课”。从数字游民转型做咖啡店“主理人”的雪莉（20250824）自豪地说，自己对所有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能坦然面对各种结果。这些能力使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处理流动中的不确定性，帮助他们拥有相对融洽的社会关系与较为稳定的日常生活秩序。

如果说收入和技能是个体层面的锚点，那么家庭关系则构成一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托底。华人青年数字游民的“离家出走”在较大程度上仍带着家的牵绊。他们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人生轨道的约束，另一方面仍然通过沟通、协商乃至向家人证明自身选择的合理性来维系家庭关系。受访者崇豪的表述深刻体现了这一点，他的流动并未彻底背离家庭，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漫长的、期待获得原生家庭认可的自我证明。他坦言，“有时候真的需要顾虑一下家里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工作在于沟通。沟通一次没办法，那就再继续沟通。如果到了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要去想，很多时候父母主要关注的点是我安不安全、可不可以自食其力。当我做出一定成绩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去阻拦”（崇豪，20250823）。这种“不断沟通”以及“以成绩换自由”的实践逻辑是传统文化与不断追求理想生活方式的志向共同作用的产物。受访者为与家人达成共识所做的尝试和对家文化的认同，说明数字游民的流动始终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引。这根线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遇到风险时可以依靠的支持，而且使他们在不断的迁移中保有情感归属。因此，家庭既提供了情感和经济支持，也构成了数字游民衡量与调整生活选择的价值参照。

地理距离和生活经验的差异使得家庭无法满足华人青年数字游民在跨国流动生活中的全部需求，他们仍需主动在清迈构建新的社会联结，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主动创造锚点。在清迈，数字游民通过参加泰拳、冥想等兴趣活动建立联系。这种社群关系并不以长期承诺为前提，它是在流动中形成的阶段性支持网络，能够创造一定的共鸣感和归属感。小双（20250827）谈到，在清迈的社交不只是闲聊，而且是一种生命叙事交换，“因为你可以从每个朋友那里听到他们的故事或者说感悟，有时候你甚至会产生一些共鸣”。当大家都在寻找某种能“理顺自己”的生活方式时，共同的经历和目标降低了互相理解的难度，也让个体敢于卸下防备、付出信任。这种努力将原本充满不确定性的陌生人交往转化为具有支撑功能的共同体，让每一个孤独的个体在碰撞中确认了自我的存在。

数字游民与旅居者这些身份所携带的流动性既是一种挑战，也教会个体如何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相处。正如小双（20250827）所说，“我之前很害怕或者很烦换地方，因为好不容易刚刚了解一个地方、建立一些联系就要离开。这次也是觉得刚认识一群非常有趣、有意思的朋友，然后就要离开了。其实我还在不断地适应……我在做选择时不需要妥协，也不需要跟风走同别人一样的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百分之百地掌握自主权让我觉得很开心”。同时，面对注定要来临的分离，华人青年数字游民展现了一种完全投入当下的状态。亚飞（20250824）将在旅居时建立起的关系描述为一段“缘分”，希望尽情体验当下的感受，“刚开始面对来来去去的人我会有一种失落感，但在分离发生得越来越多后我便适应了。我就想着在这短暂的时间内珍惜这段缘分。以后大家离开清迈了，很有可能就不再联系了。可能我不愿意跟他联系了，也可能他不愿意跟我联系了，有很多因素。所以说我就不纠结这个事情，还是喜欢结交更多的朋友”。这些社群关系较少以未来的利益交换为明确目标，只涉及当下的情感满足，在情感层面发挥了“临时托底”的功能。由于明确意识到社群关系有一定的存续期限，他们会努力在有限的时间内提升陪伴质量，将短暂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转化为高浓度的当下体验，使个体在流动中获得存在感与被理解感。

对许多受访者来说，这些异乡的社群也会被他们建构为心理意义上的“家”。李奥（20250825）说，“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属于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anywhere’的人，他们只要有咖啡馆和 Wi-Fi，在哪里都可以；还有一种是属于 ‘somewhere’，即 ‘此地’的人，因为他们觉得 ‘此地’有家和朋友”。数字游民看似可以去往任何地方，却通过努力建设社群，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殊心理锚点。童童（20250827）还提到，清迈的很多社区“完全是自由组建的”。这种自组织的特性意味着每一个参与者都是社群的共同缔造者，大家分享自己在清迈的经验，互帮互助，共同编织一张安全网。借助这张网，他们得以在保持独立和自由的同时，获得集体提供的温暖与支持，通过一定程度的社会嵌入缓冲跨国生活带来的孤独及不安。不确定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总而言之，收入、技能、家庭与社群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多重锚点，在不同层面为流动生活提供了暂时且必要的确定性。数字游民从初到清迈时对新奇感的追逐，逐渐转向对日常节奏的重新安排，并进一步通过财务规划、能力积累、家庭协商与社群联结，为不确定的流动生活提供多重支持。新奇与日常、流动与停泊、开放与稳定得以在具体实践中共存。“可控”正体现为个体通过维持当下生活的基本秩序，为下一阶段不确定的选择保留了空间。

五、意义与身份的不确定性管理

在流动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受访者面临的问题已不仅是如何安排工作和生活，而且包括如何理解并呈现自己的身份。数字游民这一身份标签本身也具有开放性，个体需要在不同情境中策略性地使用、解释或协商它的意义。

在实践层面，数字游民标签往往是一种高效的自我介绍工具，能够帮助个体进入社群、建立联系。但在自我理解层面，受访者却认为这一标签过于简化，难以概括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这种“虽使用但不完全认同”的状态使数字游民身份成为一种可被调用的资源，在看似一致的标签下，个体的处境、流动经历与生活状态实则各不相同。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既有研究多将数字游民界定为一种以远程工作、高度流动和多地栖居为特征的生活方式，这类定义试图清晰地描绘这一群体的职业与生活状态。然而，多位受访者强调这个定义并不能准确描述他们。在回应“是否认同自己是数字游民”这一问题时，易可（20250827）说，‘我没有数字（工作）的部分，我只有游民（的身份）”。仁华（20250825）也说，‘我也算不上那种数字游民，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米拉（20250824）更是明确指出，‘我不会把自己当作数字游民，这个词并不能代表我，（被称为数字游民）不过是在社会意义上套了个名头”。以上表达均说明，这类操作化定义并不能充分概括受访者复杂而流动的生活经验，甚至给他们带来一种被框定的不适感。数字游民的名称在田野中显得不完全适用，是因为它试图为一种尚未完成、仍在变化的生活状态提供稳定的定义。受访者的回应也恰好反映了他们在不断寻找自身位置的状态。

随着数字游民逐渐进入公共讨论，这一概念也被赋予了相对固定的含义。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它既是一种吸引流量的标签，也常与咖啡馆办公、精英化的自由职业者等符号联系在一起，被浪漫化为自由、低压力、没有竞争的理想生活模板，一套关于数字游民的典型想象逐渐形成。正如易可（20250827）所言，‘（数字游民）这个概念其实是从2022年开始火的，那个时候国外的一大波人因为疫情一直处于远程工作的状态中，就成为了数字游民，这股风潮传到了国内。我觉得现在它变成了一种潮流，有些人动不动就跟风说自己是数字游民”。

伴随着对这一生活方式的浪漫化想象，数字游民在部分公共讨论中也被误解甚至污名化，被贴上“班味”“逃避”“不务正业”等标签。易可（20250827）澄清道‘我觉得现在网上的数字游民‘班味’太重了，如果我说我是数字游民，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就是在远程工作，但是我并没有一直在远程工作，我觉得我更多地是在远程生活，在体验生活、体验风土文化。”另外，数字游民的污名化往往源于几类典型的刻板印象。例如，很多人认为他们不工作、只娱乐，忽略了他们仍在远程工作的事实；有人认为他们是在逃避竞争，将这种对特定的人来说合理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生活选择解读为没有能力或不思进取；也有人将网络上的内容当作他们的生活本身，认为他们只是精致且做作地在网络上表演。李奥（20250825）表示，自己以前是反感这个概念的，对数字游民持有一种“又想国际化、又不融入”的刻板印象。正是这些污名使不少数字游民在日常生活中想要远离这一标签。

数字游民这一名称具有多义性，在学术研究中它是职业范畴，在商业营销中它是消费符号，在国家治理中它是边缘身份，在社交媒体上它是流量词汇。这一多义性恰恰意味着它具有“液态身份”的典型特征，即标签不稳定、边界模糊和用途多元。数字游民既是工作方式，又是生活方式。受访者的“不认同”并非否定这种生活方式，而是在他们看来，数字游民只是一种生活的过渡状态。他们往往抗拒将数字游民当作固定的身份标签，因为这种命名意味着过早界定了他们尚未定型的人生轨迹。许多受访者表示，自己不是数字游民，而是在这段时间里探索自己人生的可能性，调整自己的状态并尝试理顺自己。这些类似的表达说明，做数字游民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中间状态”（in-between），是一段用来寻找节奏、认识自我和探索其他可能性的人生时期。因此，身份的不确定性成为一种被主动维持的状态，数字游民借助这种“未完成性”为未来保留了调整和转向的可能。

虽然受访者会与数字游民这一身份标签保持距离，但他们并未完全拒绝在一些场合中使用它。相反，他们会在必要时策略性地使用这一身份。在跨国环境中，数字游民是一种理解门槛低、可共享的身份描述。在社交情境中，它能使互动对象立即理解这一标签使用者的大致状态。因此，数字游民这一身份标签既可充当进入社群的通行证，也能成为建立联系的捷径。有受访者在访谈中拒绝被归类为数字游民，却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主页或创作内容中加上了数字游民的话题标签。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要求内容具备可识别的入口。数字游民近年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高度可见、搜索量巨大的关键词，在受访者看来，使用数字游民的话题标签更容易获得算法推荐和曝光，可以吸引同类，并让内容被特定人群浏览。换言之，使用这个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词语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在社交媒体平台的逻辑下，身份不再只是个人经历的沉淀，而是一种可流通的消费符号。田野材料表明，一方面，旅居者在线下与数字游民这一标签保持距离，以避免受污名化刻板印象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清楚标签是必要的，在线上使用标签能让自身从中受益。旅居者明知标签无法代表自己，却仍在社会互动与自我呈现时借用它。由此可见，他们在线上与线下的身份表达之间呈现一定的张力。

这种在不同场景中切换身份表述的做法，体现了将身份视为工具而非本质的逻辑。通过策略性地使用数字游民标签，个体得以在社会互动、社交媒体逻辑与自我认同之间维持平衡，进而避免自身复杂的生活经历被单一叙事所约束。身份标签的多义性与可变性为数字游民保留了重新解释自身经历、调整生活方向的空间，为他们的流动生活提供了一定的自主性与可控性。这里的“可控”是指个体能够掌握身份标签的使用时机和边界，避免外界评价支配自己对自我的理解。就这一层面而言，身份的不确定性反而成为个体维持生活弹性、拓展未来的一种资源。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清迈为观察窗口，研究华人青年数字游民如何将不确定性纳入日常生活。他们通过地点筛选、制度套利、关系建构与身份协商等策略，减少流动中可能发生的变化带来的冲击，这一发现能够补充既有研究中将不确定性仅视为外在风险或结构性后果的取向。在地点层面，清迈在文化上的半熟悉性降低了迁移的心理门槛与适应成本，使个体得以在异国情境中快速建立日常秩序，而这里与中国大城市不同的日常生活节奏又为个体提供了想象另一种可能性的空间。在制度层面，短期签证的灵活性与合法劳动的边界构成了一个框架，个体在其中进行精细的合法性计算，通过周期性的停留更新并延续流动状态。在日常生活层面，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收入、技能、家庭、社群关系等锚点共同构成一个支撑体系，使流动不至于因不稳定而失序。在身份层面，个体通过策略性地拒斥或使用数字游民标签，在被看见与坚守真正的自我认同之间保持平衡。在文化叙事层面，数字游民往往以“自由”“选择权”“探索”等字眼描述自身的生活方式，进而将结构性风险重新理解为个体自主性的体现。例如，收入不稳定被解释为摆脱组织约束后的代价，空间流动被描述为主动选择的生活实验。通过这种叙事框架，行动者得以在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接受不确定性的存在，并将不确定性视为实现个人价值与生活意义的重要条件。这些层面的协同运作，使不确定性得以转化为可被组织和利用的生活条件。

数字游民在外界叙事中被想象或简化为一个同质性极高的群体，但实际上这一群体内部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阶层背景、文化资本、先前的职业路径以及所处国家的社会结构等因素，共同塑造了个体进入跨国流动生活的方式，也决定了他们面对的不确定性的可控程度。受访者亚飞代表的是可控程度相对较低的一类人，他们的实践核心是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最大化利用停留的时间，他们的未来规划也高度依赖短期内能否获得新的收入来源。相较而言，拥有稳定远程岗位的受访者春华和尼尔的经济锚点更为牢固，技能的可迁移性更高，因此他们在停留时长和未来规划上都拥有更大的弹性空间。由此可见，“可控”是一个受具体资源条件约束、程度因人而异的状态。对那些经济资本薄弱、技能可迁移性低或家庭支持不足的个体来说，管理不确定性的空间更为有限，他们更易滑向“不可控”的边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可控”仅涉及个体能够识别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干预的那部分不确定性，大量“未知的不确定性”（如突发的公共事件等）仍属不可控的范畴。

不确定性正在以可学习、可内化、可再生产的方式，成为数字劳动世界的重要文化结构（顾楚丹、杨发祥，2022）。本文试图揭示不确定性如何被转化为一种可承受、可利用的生活条件，而不像既有研究那样将不确定性识别为源于外部的、需要被规避或治理的问题。本文提出“可控的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将对不确定性的分析视角从外部转向内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部，关注行动者如何通过地点选择、日常安排、经济与社会嵌入以及身份标签的策略性使用，进入一种可控的生活状态。本文也关注制度边界、资源差异与阶层分化如何限定不确定性被控制的程度和期限。必须承认的是，本研究能够观察到的数字游民，本质上都是那些成功将不确定性维持在可控区间内而得以持续流动的个体。那些因锚点松动或不确定性超出控制范围而被迫结束流动的个体，不在本研究的观察视野内。

既有研究指出，不确定性已成为渗透个体、组织与治理层面的结构性现实，社会学需要完成以不确定性为逻辑起点、以“行动韧性”替代基于线性进步观的“结构理性”的范式转换（文军、顾楚丹，2025）。就此而言，本文探讨的数字游民生活实践中“可控的不确定性”，可被视为一种微观层面“行动韧性”的生成机制。个体在不确定性中通过多重锚点的综合调用，创造了局部的确定性，以维持生活的可持续与自我叙事的连续性。本文从泰国清迈华人青年数字游民的案例中发现，不确定性一方面被转化为自由和可能性，激发了主体能动性；另一方面又借由责任个体化的逻辑，将更多的风险和成本压回个体身上，使“可控”状态高度依赖经济实力、专业技能、语言能力与跨地域网络等资源。资源组合的差异决定了不确定性被控制的程度和期限，并在群体内部制造了新的分层。因此，本文探讨的“可控的不确定性”，既是青年对结构压力的主动回应，也是一种被结构条件限定的选择结果。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通过更长时段的追踪观察来考察这种“可控”状态的持续性，以及不确定性文化对个体心理和生活秩序的长期影响。我们也会将数字游民的经验纳入更广阔的社会议题之中，继续思考当越来越多青年以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应对结构变迁时，制度如何为这种新型生命历程提供更具韧性的保障与公共性支撑，从而避免将不确定性带来的系统风险完全转移给个体。

参考文献：

顾楚丹、杨发祥，2022，《把不确定性当作文化：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日常实践逻辑及其反思》，《社会科学》第12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马中红、井常灿，2024，《编织童话：基于多模态互动分析的数字游民在线叙事与身份认同》，《新闻与写作》第 12 期。

Naphattamon Sae-Phan、王元超，2021，《感性、惯性与理性——泰国中国新移民的迁移动机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 3 期。

王云龙、文军，2024，《在不确定中构建自主性：数字游民的日常劳动实践及其反思》，《浙江学刊》第 1 期。

文军，2023，《回到“不确定性”：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反变》，《浙江学刊》第 3 期。

文军、顾楚丹，2025，《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文军教授访谈》，《学术评论》第 6 期。

徐琳岚、文春英，2023，《“何以为家”：流动社会下青年数字游民的地方感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 8 期。

姚建华，2025，《“不稳定感”：数字游民研究中的劳动新议题》，《探索与争鸣》第 3 期。

曾昕、沙垚，2024，《虚拟与现实的居间地带：数字游牧青年的新型社会化实践》，《新闻与写作》第 12 期。

张月月、李彬，2025，《论数字游民的媒介化生存》，《新闻战线》第 4 期。

Bauman，Zygmunt 2000，*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Polity Press.

Bozzi，Alberica 2024，“Digital Nomad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s and Mobilities：A Literature Review.”*European Transport Research Review* 16(1).

Bygnes，Susanne & Marta Bivand Erdal 2017，“Liquid Migration，Grounded Lives：Considerations about Future Mobility and Settlement among Polish and Spanish Migrants in Norway.”*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3(1).

Cook，Dave 2023，“What Is a Digital Nomad？Definition and Taxonomy in the Era of Mainstream Remote Work.”*World Leisure Journal* 65(2).

Elliott，Anthony & John Urry 2010，*Mobile Lives*：*Self*，*Excess and Nature*. Abingdon：Routledge.

Engbersen，Godfried & Erik Snel 2013，“Liquid Migration：Dynamic and Fluid Patterns of Post-Accession Migration Flows.”In Birgit Glorius，Izabela Grabowska-Lusinska & Aimee Kuvik (eds.)，*Mobility in Transition*：*Migration Patterns after EU Enlargement*.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Green，Paul 2020，“Disruptions of Self，Place and Mobility：Digital Nomads in Chiang Mai，Thailand.”*Mobilities* 15(3).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Hannonen，Olga 2020，“In Search of a Digital Nomad：Defining the Phenomen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2(3).

Hermann，Inge & Cody Morris Paris 2020，“Digital Nomadism：The Nexus of Remote Working and Travel Mobility.”*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2(3).

Jansen，Tom，Liesbeth Claassen，Irene van Kamp & Daniëlle R. M. Timmermans 2019，“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Uncertain Risk’. A Qualitative Study among Different Societal Groups.”*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2(5).

King，Russell 2018，“Theorising New European Youth Mobilities.”*Population，Space and Place* 24(1).

Makimoto，Tsugio & David Manners 1997，*Digital Nomad*. Chichester：John Wiley & Sons Ltd.

Miguel，Cristina，Christoph Lutz，Rodrigo Perez-Vega & Filip Majetić 2025，“‘Alone on the Road’：Loneliness among Digital Nomads and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to Fos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Media，Culture & Society* 47(3).

Nash，Caleece，Mohammad Hossein Jarrahi，Will Sutherland & Gabriela Phillips 2018，“Digital Nomads beyond the Buzzword：Defining Digital Nomadic Work and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In Gobinda Chowdhury，Julie McLeod，Val Gillet & Peter Willett (eds.)，*Transforming Digital Worlds*. Cha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heller，Mimi & John Urry 2006，“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Economy and Space* 38(2).

Standing，Guy 2018，“The Precariat：Today's Transformative Class?”*Development* 61(1-4).

Woldoff，Rachael A. & Robert C. Litchfield 2021，*Digital Nomads：In Search of Freedom，Community，and Meaningful Work in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责任编辑：宋丹丹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Special Subject on Youth Employment Preferences and Choices

Managed Uncertainty

…… *Deng Yanhua, Dai Jiachun, Tu Hongwei & Liu Ying* (68)

Abstract: Based on fieldwork among young Chinese digital nomads in Chiang Mai, Thailand,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managed uncertainty" to examine how individuals confronted with uncertainties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transform uncertainty into tolerable and productive living conditions through multiple strategic practic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young Chinese digital nomads seek to render uncertainty as controllable as possible by selecting destinations that are culturally familiar and institutionally reliable, establishing everyday routines that can be sustained across different places, and strategically deploying identity labels. However, due to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capital,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social network support, the degree of such "controllability" varies markedly within the group.

Keywords: Digital Nomads; Managed Uncertainty;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 Mobility

Stability First or Salary First?

…… *Xu Qi, Wang Jianfu, Bai Yunfan & Zhu Yuanqing* (90)

Abstract: Based on self-collected survey data from university graduates, this study employs a survey experiment design to examine university graduates´ preferences for public-sector employmen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while the type of employing organiz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s graduates´ career choices, income is a substantially more influential factor. A general preference for public-sector employment exists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graduates, although the strength of this preference varies systematically. This preference i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relatively high income, moderate workload, and comprehensive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public-sector jobs, rather than by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itself.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